

古代中国

治国理政思想

可以知治，可以知德，可以知学

◎王國棉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古代中国 治国理政思想

◎王国棉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古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王国棉著.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7. 9
ISBN 978 - 7 - 5440 - 8946 - 3

I. ①古… II. ①王… III. ①政治思想史 - 中国 - 古代 IV. ①D0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2148 号

古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

GUDAI ZHONGGUO ZHIGUOLIZHENG SIXIANG

策 划 人 郭志强
责任编辑 郭志强
助理编辑 晋晓敏
复 审 刘晓露
终 审 杨 文
装帧设计 薛 菲
印装监制 蔡 洁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7号 电话: 0351 - 4035711 邮编: 030002)
印 装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276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40 - 8946 - 3
定 价 5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351 - 4120948。

序言

推进道德建设是古代中国 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使命

说到治国理政，很多人会认为这只是帝王将相操心的事情，或者说只是各级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事情，跟普通老百姓没有太大的关系。的确，从古到今，大多数人确实无缘参与到治国理政的具体事务中来。不过，要说治国理政与寻常百姓一点关系也没有，那也不对。因为，治国理政的成效与老百姓息息相关。所以，治国理政的方向正确，老百姓跟着受益。反之，老百姓则会深受其害。当然，任何一个政权为了谋求长远的存在，都必须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为尽可能多的群体谋取福祉。

推进道德建设与大力发展经济是并行不悖的两件大事，是古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使命。《孔子家语·贤君》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治国理政有两件事不能等。一是发展民生，让老百姓富裕起来；二是让老百姓活得更长寿。”鲁哀公问道：“那怎么才能办成这两件事？”孔子回答说：“要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轻徭薄赋，就能使老百姓富裕；同时，要搞好道德建设，让老百姓远离犯罪，就能使人更长寿。”鲁哀公说：“我也想按你说的做，但担心这样做了使国家陷入贫困。”孔子回答说：

“不会的，老百姓与国家的关系就好像是子女与父母的关系，哪有子女富有而父母受穷的道理，因此，也就没有老百姓富有而国家贫穷的道理。”^①孔子的话充分说明推进道德建设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意义。

从历史规律来看，治国理政的效果好坏可以从社会风气上反映出来。但凡治国理政方略正确的时期，往往能够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反之亦然。众所周知，一个社会风气的形成有赖于人对社会风气的全面认识。一般来说，人对社会风气的认识来源于三种途径：首先是来自于家庭的间接认识，如每一个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立身、做人、做事的各种训诫；其次是来自于学校教育的理性认识，从古代的蒙学、义学到现代学校的品德教育，使每一个人逐渐积累对社会风气的理性认识。此外，是来源于人踏入社会之后的感性实践。这一部分认识对社会风气的作用最为关键。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人对早先从家庭与学校获取的社会风气的经验式认识进行实践验证。如果社会实践获得的验证与先前的理性认识相互一致，则会使其更加笃定地坚守下去，成为社会风气良性循环的有力助推者；反之，如果现实的社会风气与先前的理性教育形成较大脱节或反差，人们就会很容易对先来自于家庭与学校的理性教育产生怀疑、摒弃，甚至于颠覆，然后以顺应社会、适者生存的名义，成为社会风气向恶性循环发展的推波者或逐流者。可见，一旦先前对社会风气认识的理性教育与现实的社会风气有较大的差距时，人便会重新作出选择，从而对社会风气形成“马太效应”。当然，人对社会风气的实践验证结果如何主要取决于国家治国理政的具体状况。在这里，参与治国理政的每一分子都会释放出与权责等量的社会效应。换言之，一个社会风气的好坏，与现实治国理政团队在治国理政中所表现的思想认识水平、道德水平、执行力等等都有关系，因为这些因素对于一个人获得验证社会风气的感性认识具有倍增效应。由此可见，增强治国理政者的思想认识水平、道德水平和执行力对

^① 原文为：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公曰：“为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敦礼教，远罪疾，则民寿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国贫矣。”孔子曰：“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贫者也。”

一个社会风气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要提高治国理政的思想认识水平，离不开萃取中国传统文化里蕴藏的治国理政思想。因为，古代中国的治国理政思想蕴藏着规律之力、真理之力，“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唐贞观年间，唐太宗告诉魏徵，他要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大唐，苦于无从着手。魏徵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应该从古代先贤那里寻找智慧。于是，李世民下旨，让魏徵与萧德言、虞世南、褚遂良等人将经、史、子中对治理国家有用的精华，浓缩在《群书治要》当中，用于治国理政。毛泽东也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无独有偶，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把历史比作“人类最好的老师”，他说，“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的大地上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②又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希望中国和各国学者相互交流、相互切磋，把这个课题研究好，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一道造福人类。”^③所以，充分认识古代中国的治国理政思想，在古代中国的治国理政思想的感悟中获得真知灼见，不仅有助于后人解释过去、了解历史；更有助于后人把握未来，从古代中国的治国理政思想的启迪中提取治国理政的“精神之钙”，明确前进方向。可以说，这也正是古代中国的治国理政思想对当代人进行治国理政的借鉴意义。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②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18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10月13日。

③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25日。

简单地讲，古代中国的治国理政思想首先是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的价值观，又被称为民本思想。《尚书》中已有“民为邦本”的思想。而“以人为本”这四个字始见于《管子》，到了孟子时，他又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价值选择。这种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思想传统奠定了古代中国治国理政的主流导向。

其次，古代中国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以德为本、以德治国。这可以说是古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的重头戏。因为，道德是树立治国理政威信的基础。《荀子·强国》中说：“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礼乐则修，分义则明，举措则时，爱利则形，如是，百姓贵之如帝，高之如天，亲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谓道德之威。”荀子认为，用暴力治国是行不通的，要任用品德高尚的官员治国，推行德政，积点滴而成大功。因为，社会风气变坏是由于社会不重礼义的缘故。礼义是防止人们漠视道德、践踏道德的手段，是治理天下的法宝。所以，社会应做到推崇礼义、标举忠信，这样国家才会强大。事实上，发挥道德高线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对于建设文明社会、法治社会也具有重大的促进意义。诚如西方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言，公民的道德要求是比较低的，“善人”的道德要求是比较高的。此言一语中的地揭示出德治与法治的差别所在。即，对一个公民而言，基本的要求是要遵纪守法，不逾越道德底线即可。而对于“善人”的要求则是在道德高线之上，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从这个角度来看，唐太宗时期的《贞观政要》中提出以仁为本、仁义为首，仁义作为基本价值，既是个人的道德观，也是治国理政最基本的价值。此外，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成为两千年来影响中国社会至深的基本道德，也是中国人治国理政中最有影响的社会理想。如1912年，孙中山领导的民国政府提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为立国之本，足见在治国理政中对传统道德的重视。不言而喻，在全社会营造道德的、自律的、自觉的社会风气更加有利于促进建设高度完善的法治社会。

第三，古代中国的治国理政思想是以实现社会和谐为旨归的。其中，“和而不同”的文明多元共生理论，“天人合一”中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生态的和谐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以及“兼爱”“非攻”为核心的和平共处的国际原则，使得中国有能力、有胸怀来促进人类社会向更高层次的价值理性方向发展。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断言，西方在经济和技术上影响和征服了全球，但是却留下了政治上的民族国家林立世界的超级难题，这个政治真空将由中华文明来补足。而只有中华文明，才能真正给予世界永久的和平。因此，汤因比给未来人类社会开出的药方不是武力和军事，不是民主和选举，不是西方的霸权，而是文化引领世界，这个文化就是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汤因比最终的论点是，一个历史上一直是以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为取向的天下文明，也将在21世纪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毫无疑问，古代中国的治国理政思想正是这一笔全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精粹与精华。

当然，要践行和落实好古代中国的治国理政思想还是要在道德传承上下功夫。习近平总书记讲，要治理好国家必须继承和弘扬传统美德，加强道德建设、形成道德规范、树立道德理想，讲道德、遵道德、守道德，最终是要指向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怎么做人。^①中华美德的继承转化，就是要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对接为现代人熟知的仁爱、道义、诚实、守信、爱国、利群、尊礼、守法、奉公、敬业等。这些内容主要是就个人道德和个人道德修养的内容来说的。用梁启超的话来讲，“重点还是私德”。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讲道德、遵道德、守道德，都是强调要落实在个人身心实践上的道德。这是我们在致力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时，在理论上必须明确的。

事实上，追求高品质的道德生活是人们孜孜以求的梦想。列夫·托尔斯泰指出：“人类被赋予的工作，就是道德成长。”在转瞬即逝的时间之流中，人总想给历史留下些永恒的东西。这就是道德的魅力。毋庸讳言，每个人对

^① 参考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2014年2月24日就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进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于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生意义都会有一种看法。不过，人生短短数十年，如何使自己身死之后而名不朽灭是许多人的梦想。古人提出了人生在世时能在“立德、立功、立言”三个方面作出努力。《春秋左氏传·襄公二十四年》中记载，鲁国叔孙豹在与晋国范宣子讨论怎样才能“死而不朽”时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这就是后世著名的“三不朽”理论。其中，“立德”是指确立什么样的道德观，追求什么样的道德生活，成就什么样的道德人生，达到什么样的道德境界；“立功”则是参与社会管理与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而“立言”则是创造出具有真知灼见的学术成果，通过著书立说以科研的形式实现不朽，从而使自己“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不过，想靠“立德”不朽对人来说难度很大，正如学者所说，我国历史上能够真正做到“三不朽”的人只有两个半，分别是孔子、王阳明和曾国藩（半个）。^①

道德对于人的不朽的重要作用也被后世许多思想家所认可。清代思想家魏源也曾提出“立德、立功、立言、立节”的“四不朽”说，是对“三不朽”思想的补充。胡适曾将“三不朽”称为“三W主义”。“三W”即指英文“Worth”“Work”“Words”，这三个词的涵义与“立德、立功、立言”相近。丰子恺等人提出人生的三层境界：物质境界、精神境界、灵魂境界。冯友兰也概括说人有四个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在这些境界说中，道德境界处于生活品质的高端。古往今来，人们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共识，恰如胡适在《不朽——我的宗教》中所言，因为道德“把每个人的—己行为与人类的历史发展关联在一起，给有限的个体生命赋予永恒的意义，人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无论是非功过、积德造孽，都要被历史记上一笔。因为，精神的感召就如同太阳，给人温暖也给人光亮”。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立德”往往与“立功”“立言”密不可分。因为，

^① 何兆武在《上学记》里也曾说过：“中国历史上真正能够做到立德，立功，立言的只有二人：王阳明与曾国藩”。曾国藩自不必说，《曾国藩家书》中对待养生、家庭、从政的见解都很独到。而王阳明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体认也很深刻，无愧为后来读书人的学习典范。

“立德”“立功”“立言”会交互体现到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如“立功”是治国理政的具体工作，“立言”则表现为科研工作。唯独“立德”没有明显具体的职业表现，但“立德”却具体体现在“立功”与“立言”的实践之中。而且，也只有具体的工作中实践自己理想的道德原则，才能使自己在“立功”“立言”中脱颖而出。可见，三者之中，“立德”最为重要，因为，道德高线是做好具体工作的重要保障。特别是对于治国理政者来说，只有保持健康、良好的道德操守，才能对百姓、对国家有所贡献。由此可见，道德对于治国理政的重要影响力。事实上，治国理政者的人格魅力影响着自身的执政能力。特别是对刚刚发展起来的中国，社会问题之复杂，已远非经济发展所能彻底解决。人们对公平正义的强烈渴望、社会对政府公信的更高期待，很大程度上落到了领导干部这个特殊群体身上，考验着治国理政者的道德追求和精神境界。没有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的操守，没有敬民如天、视民如伤、为民奉献的情怀，再快的经济发展也迈不过“塔西佗陷阱”，再多的人民币也摆不平人民的问题，更不用说赢得群众发自内心的信任和支持。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作为对领导干部的要求绝不是一句空话。

总之，推进道德建设无疑是古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使命。为了推进道德建设，培养人格魅力，就要“自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老老实实向人民群众学习，时时处处见贤思齐，以严格标准加强自律、接受他律”^①。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讲话，既道出了古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是一以贯之的精神血脉，也强调了它理所应当成为后人培养人格魅力、彰显道德力量的丰沃土壤。

^① 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的讲话》，2014年5月10日。

前言

当代全球性治理失效的成因探析

如果把社会比作一副多米诺骨牌，那么，治国理政者及其团队无疑是居于多米诺骨牌的起首。起首立则整体立，起首垮则整体必然呈现连锁式垮塌。特别是对于社会道德风气的影响更加明显。可见，起首的状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故而，治国理政者如果缺仁少德，往往会造成社会风气的败坏。

从深层次讲，社会风气的败坏常常也是思想转型或者思想缺位的结果。一般来说，一个社会倘若失去了传统治国理政思想的支持就很容易陷入无序化发展的危机，或者说是由于颠覆传统道德理性而导致失去传统道德资源的支持，往往会造成人们对其存在的持续性产生怀疑。当代人类社会中，治国理政观念的失效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与失去传统道德资源的支持密切相关。这也导致了当代人对道德的践行陷入了无序化发展的危机，使得人类社会正步入一个危机四伏的“高危时代”。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

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①

为了全面有效应对各种全球性、区域性的新型危机，由国际组织、民族国家、非政府组织、企业、民众以及媒体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全球治理模式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但这仍然不足以应对现有的以家庭、国家为中心的治理危机。因为，当前道德的滑坡与科技的进步、社会的进步已发生严重的乖离。所以，由于人口膨胀、科技异化、人性贪婪、发展至上、治理失效以及全球网络等诸多原因导致生态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精神危机等大量“现代性”的危机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可以说全球性的政治不稳、经济动荡、核战争威胁、生态恶化、科技异化、恐怖主义等问题将人类带入了一个空前复杂、多变和高度化的危机时代。

从全球视域来看，近年来，由于社会的高度发展，以人为因素为主导的灾难正在使人类进入一个机遇与风险并存的高危时代。比如，对于科技发展的利弊问题，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和日本著名佛教思想家池田大作在《展望21世纪》中认为，在现代技术文明还没有覆盖整个地球以前，人们遇到的灾害差不多都可以说是自然灾害，由于科技的高度和应用，地球变得都在其影响之下了。从此，纯粹的天灾不可能出现了。科学知识作为一柄双刃剑，既给人类带来益处，又给人类带来灾难。而这种灾难集中体现在道德伦理层面，正如马克斯·韦伯曾经深刻指出的那样：“这种具有颠覆性的伦理观念的建立显得力量单薄和举步维艰。传统是我们从祖宗手里接过的传家宝，当然不是僵死的东西，因为我们不能原封不动地传下去，因为我们存在过，就有存在的意义。这个意义恰恰在于时代性和对人类自身的生存的保证，至少是焦虑。”所以，无论现代治国理政风险大体有多多样性、突发性、循环性、扩散性、隐匿性、高危性、不可控性及关联性等特点，还是综观其产生的根源和领域、传播的方式和速度、危害的范围和强度、治理的要求和难度等诸环节、诸阶段，再或者形成“高危时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

^①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25日。

根本的是人为因素作用的结果，特别是人的道德修养失去理性化的结果。这直接导致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人类再一次进入互害模式，人人逃不脱。你觉得你占了便宜，我觉得我占了便宜，最后谁也占不了便宜。这就是处于互害社会生态链中个人的典型心理。网络安全、食品安全等方面问题高发正是互害模式的必然结果，处在这个链条中的每个人，都逃不脱被伤害的结局。

从经济本质上来看，当前人类所面临的高危是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必然伴随的阵痛。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摆脱贫困》中所言，商品经济毕竟有其固有的一些消极属性，资产阶级极端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念还不时地在毒化人们的心灵，拜金主义还会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膨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商品拜物教。所以，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研究范式对深入研究当代治国理政危机问题的核心和根本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马克思指出，“高危时代”的产生在本质上体现为资本对人类实践平衡的根本性破坏，是资本逻辑的演变及其对人类世界统治所导致的必然结果。^①毫无疑问，通过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可以说，正是市场经济打翻了人类道德的底牌。对于这一点，就像《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太史公司马迁感叹的那样，孔夫子极少讲利的问题，其原因就是要经常防备这个祸乱的根源。所以他说，让人们自由地去追求利益，会招致很多不满情绪和道德滑坡。不管是哪个阶层的人，一味追求利益而无视道德约束与道德修养的弊端都是一样的！^②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度制》中也这样认为，他说：“利者，盗之本也。”

而从老百姓的立场来看，近年来，经济发展引发的“四高”（高房价、高物价、高学费、高医疗费）之症也迫使人们向钱看齐。当然，百姓追求经济利益，这本来无可厚非，正如管子曰：“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不过，金钱至上的价值观渗透到人与社会肌体的每一个部位，不断蚕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第267页。

② 原文为：“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

着传统文化信仰的生存空间。《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作者英国人马丁·雅克指出：“全球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成为腐败的三大原因。尤其是中国，今天社会已成为钱、钱、钱的社会，而不是以前讲究仁爱、团结、纪律的社会。改革开放以后，对于官员的评价越来越注重他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见，现阶段，由于政策导向、评价导向的问题使得近年来社会上不讲规矩、不讲道德、不顾廉耻、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不思未来、不管子孙后代利益的行为不断上演。毫无悬念，当前的社会转型必然打破与历史传承相适应的治国理政的平衡状态，从而使我国在整体上已进入一个治国理政风险高发的阶段。这主要表现在治国理政遇到挑战、贫富差距悬殊、群体事件上升、经济体系脆弱、政治生态复杂、自然灾害严重、安全事故频发等几个方面。当然，造成治国理政风险高发的原因除了道德因素外还有很多，诸如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加剧了利益分配不均和利益分化程度，社会转型与制度转轨导致成熟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缺失，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利益的裂变加大了国内社会风险的累积，社会成熟度不高放大了风险产生的概率和风险治理的难度，等等。

不言而喻，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的培养和道德素质的修养，逐步形成与现代生产和生活需要相适应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和生活方式。我们切不可物质上脱贫了，精神上却愚昧了。我们需要的是“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而这不仅是涉及“兴国”之策的大问题，也是“立人”的根本性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国家理想、中国特色与中国道路、民族文化之根本的高度，强调以理想、文化与道德“立人”和育人的重要意义，这是我们党在精神文明、文化道德建设方面的重要理论发展。要不断提高对“中国梦”的认同与追求，不断提高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而共同奋斗。^①有鉴于此，如何有效地防范、规避和应对社会风险，成为事关社会稳定甚至人类发展命运的重要议题。可以说，在全球治国理政研究中，国内外

① 肖群忠：《铸民族文化道德之魂——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理想、文化、道德的重要论述》，《中国教育报》，2014年2月26日。

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和立场做了大量、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些颇具价值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各自的不足。我国目前社会风险治理虽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有待完善。所以，本书立足于新国情，立足于道德建设的视角，从中国古代的治国理政思想中寻求智力支持，旨在提高我国的治国理政水平，以期形成正确的思想认识，形成科学有效的治国理政措施。从而提高政府公信力，培育社会良性运行环境，增强社会成员的理性、淳朴和诚信，为促进国家稳定与世界和平有所贡献。

总之，在现代社会治理思想日益发达的今天，重新梳理古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仍然具有重大意义。诚如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谢短篇》中所说：“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说的是治国理政者既要了解传统的治国理政思想，也要熟悉当代的前沿信息，才能全面地做到鉴古知今，古为今用。相反，对传统的治国理政思想一知半解或者一窍不通的危害性极大，其后果轻则导致盲人摸象般的片面认识，重则是夜半临崖式的致命危险。所以，一定要对古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的源、革、流、变有全面的认识，并使之转化为促进改革发展的正能量，从而真正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个讲清楚”^①的内涵落在实处。

① 2013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四个“讲清楚”：“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2014年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了两个“讲清楚”：“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目 录

概 论 / 1

- 第一节 古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是以儒学为主导的思想体系 / 2
- 第二节 道德修身理论是古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的内容主体 / 13
- 第三节 古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的实践意义 / 31

第一章 儒家对古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的系统性开创 / 49

- 第一节 孔子：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奠基人 / 49
- 第二节 孔学中包蕴的治国理政思想 / 53
- 第三节 治国理政者基本的道德素质 / 57
- 第四节 “为政以德”的治国理政模式 / 68
- 第五节 孔子推行治国理政思想的教育实践及其影响 / 73

第二章 道家对古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的深远影响 / 79

- 第一节 道家参与治国理政的历史轨迹 / 80
- 第二节 道家对其他治国理政思想的兼容 / 87
- 第三节 道家在治国理政中的优越性与历史局限性 / 94
- 第四节 道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 99

第三章 墨家治国理政思想对儒家的继承与突破 / 104

第一节 立足于被治理人的治国理政思想 / 105

第二节 墨家与儒家在治国理政思想上的关联 / 109

第三节 墨家治国理政的具体方案 / 118

第四节 墨子对儒家思想的突破及其在现当代治国理政中的影响 / 129

第四章 曾子与子思对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进一步深化 / 134

第一节 曾子对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发扬 / 135

第二节 子思对孔子治国理政思想的传承 / 150

第五章 孟子对儒家治国理政体系的系统化诠释 / 160

第一节 老百姓是天：孟子治国理政思想的立足点 / 161

第二节 性本善是孟子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基石 / 164

第三节 “仁政”的治国理政模式 / 169

第四节 个体修身靠“养气” / 175

第五节 孟子推行治国理政体系的教育实践及其影响 / 178

第六章 儒学在汉朝治国理政中的全面实践 / 181

第一节 董仲舒：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成功实践者 / 182

第二节 “大一统”思想上升为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 / 185

第三节 “天人合一”与“天人感应”在治国理政中的具体运用 / 188

第四节 官德和民德在治国理政中的体现 / 194

第五节 董仲舒推行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教育实践及其影响 / 199

第七章 佛教参与治国理政的精神感验与价值辐射 / 204

第一节 佛教参与治国理政过程中的起起落落 / 204

第二节 佛教为参与治国理政所作的革新 / 211

第三节 佛教参与治国理政的精神感验 / 219

第四节 佛教参与治国理政的价值辐射及其深远影响 / 223